

明清理学家张履祥的农本思想

陈海红

(浙江行政学院 哲学部,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张履祥, 在变革动荡的社会走入乡间, 认识到并重新诠释了农业的重要地位, 认为农业关乎百姓生活、家国天下治乱兴废存亡, 又通过亲身践履农业生产活动, 著述了《补农书》, 总结出嘉湖特定区域的农业生产技术, 提出了重视兴修水利等重要主张。对于造成农村社会问题的根源, 他还从吏治等维度开展了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 张履祥; 理学家; 农本思想; 《补农书》

中图分类号: F31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3)01-0082-07

Neo-Confucianist ZHANG Lv-xiang's thought of taking agriculture as foundation

CHEN Hai-h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Zhejia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days of Qing dynasty, Neo-Confucianist ZHANG Lv-xiang came to the village and concerned about the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of his time in his social reflection view. He realized profoundly and reinterpre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agriculture; and carried on the agriculture labor and wrote *Supplement to the Book on Agriculture*, which summarized diligently the agricultural knowledge of Jiahu area and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 such as building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On the issue of the rural social problems, he reflected the unfair social system of his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fficials administration.

Keywords: ZHANG Lv-xiang; Neo-Confucianist; the thought of taking agriculture as foundation; *Supplement to the Book on Agriculture*

张履祥(1611 - 1674), 字考夫, 号念芝, 今浙江嘉兴桐乡人, 明末清初重要的理学家(道学家)、教育家与农学家。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学术反思思潮中, 不同于绝大多数理学家, 他选择了一条“井牧六经俱耕耘”^①的人生道路, 步入乡间关心民间生活, 热心乡村改造, 躬耕田亩且有农学著作《补农书》传世。张履祥步入乡间不是以普通农民的身份, 甚至也不是以一般的农学家劳作田亩, 他是明末清初反思学术、社会变革实学思潮中的中坚人物, 是所谓的“谈心论性”道学家的特例。身为道学家而重视农业, 实为不易; 重视农业而躬耕田亩, 更为难得; 躬耕田亩而形成农学, 尤为可贵; 形成

农学而论世探源, 至为独到。其“井牧六经俱耕耘”的独特道学人生选择, 在中国理学史、教育史与农学史上都有着独特的意义, 起到了引领明清社会学风、世风转型的重要作用。针对张履祥的乡间生活, 武道房、吴潍嘉《张履祥的乡村自治与移风易俗思想》(《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2年5期)探讨了张履祥提出“保聚之法”以促进乡村和谐与稳定, 作“丧祭杂说”以移风易俗; 周邦君《张履祥笔下的灾异与社会问题》(《青岛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8期), 《明末清初江南农业生产与灾害防治——以张履祥的视野为中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 《明末清初浙北自然灾害与荒政措施——以张履祥的视野为中心》(《农业考古》2008年3期)论及了张履祥对自然灾害与农业生产关系的重视。以上研究分别从乡俗、灾害等层面对张履祥的农业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考察。实际上, 在明清之

收稿日期: 2012 - 12 - 30

作者简介: 陈海红(1972—), 男, 安徽安庆人, 副教授, 博士。

际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作为理学家的张履祥，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有系统的考察和反思，甚至引领了当时的社会、学术反思思潮，开创了理学发展的新路向。笔者拟对其农本思想予以梳理，以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建设提供启示借鉴。

一、“务本力穡”的重农理念

明末社会动荡，继之政权更迭，一批学人在家破国亡中痛苦反思社会变革的原因，并力求进行社会改造。他们大都从学术本身来寻求社会变乱的原因，并认为正是王阳明良知之学及其后学流弊为代表的道学思想，造成了明代中叶以来的伦理失序、社会沦丧与政权易代。王夫之曾说：“王氏(王阳明)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发肤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1]371}张履祥也说：“本朝至隆、万以后，阳明之学滋蔽，而人心陷溺极矣。卑者冥冥于富贵利达，既惟流俗之归，而其高者率蛊于李贽、袁黄猖狂无忌之说，学术于是乎大裂。”^{[2]635}也就是谴责阳明之学的社会流弊及其危害。

不过理学家们虽然认识到“空谈心性”的道学之害，也力求从实处入手来解决社会之乱，但真正能够走出理学重视形上之思理路的并不多见。不同于耻谈农事的道学先生，张履祥吸取了史上事功、实行学派的重农思想，将稼穡之事作为自己关注的重点，力求走出一条能够改变学风、士风与民风的实学道路。他在现实分析明代中晚期社会现实后，认为要解决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异族侵扰造成的连年用兵而加剧的物质财富的需求，必然要求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出，来支撑国家正常运转，维系下民日常生机。张履祥修正了道学先生“格君心之非”的道德说教在国家、社会与百姓生活中的至高地位，并在现实见证商人逐利带来的社会危害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上下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业也就是稼穡的重要意义。

张履祥认为“务本力穡”关乎百姓生活、家国天下治乱兴废存亡。他说：

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乱、国家废兴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知耕者。今虽农家之子，有不能秉耒耜者矣，有不能辨菽麦者矣。殷天子之子生长民间，是以圣贤之君六七作。周公陈幽风述王业之本，使人主知小人之依，是以有道之长，无过周者。汉以孝弟力田取士，故其俗犹为近古。至于南北分争之日，上下一于浮侈。隋唐继之，其风益甚，取士者以诗赋，请谒者以文辞，而务本力穡之事荡如矣。相沿至于今日，人人耻不文，不耻不仁；畏不奢，不畏不义。间有一二稍近本实，则群鄙共笑之。而此一二人者，亦复低首汗颜，诋而谢之。是以世道人心，祸若此烈也。^{[2]993-994}

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张履祥总结出是否重视稼穡决定了一个朝代的社会风气，也会造成不一样的历史结局。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在于他自己生活的社会人人耻谈“务本力穡”之事，甚至出现农家子弟亦不操耒耜、不识菽麦的地步。他认为，这是社会败坏的标志，也会更进一步导致社会走向无序与没落。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江南部分地区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之时，张履祥在此时孜孜于当时已处于次要地位的农业之论说，提出农业是“国家废兴存亡之本”，更加体现了一个理学家的宏观视野和独到眼光。明清易代的现实，证实了张履祥的这一判断。

另外，张履祥认为，躬耕稼穡能够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达致理想的社会状态，也是学者乱世立身自处的人格保证。他说：

夫能稼穡则可无求于人，可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穡之艰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古之士，出则事君，处则躬耕，故能守难进易退之节，立光明俊伟之勋。其为政也恭俭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廉洁，其居位去位也如一日，其达行穷居也各有为，未有进退失据不知重轻者也。今之卿大夫，贪墨无厌，寡廉鲜耻。士庶人诈伪百端，食嗟来之食，甘疇蹴之加。只坐不能无求，故至于不畏不义；不能不妄求，故至于不耻不仁也。夫与其文而为不仁，孰若朴而以仁存心；与其奢而为不义，

孰若俭而以义律己。吴康斋先生讲廉、洛之学，率弟子以躬耕；刘忠宣公教子读书，兼力农；何粹夫官归，辟后圃种菜，俱可为百世之师也。许鲁斋有言，学者以治生为急，愚谓治生以稼穡为先，舍稼穡无可为治生者。《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得至，心向往之，是之谓矣。^{[2]994}

有稼穡之能，则无求人乞食，就能够立廉耻之心；知稼穡之艰，则有体谅之情而不妄求于人，从而兴起礼让之风。立廉耻，兴礼让，通过正人心的功夫就会实现社会隆盛。他还以之推及士人为政、立身、居位去位的态度，在古今对比中得出，出处进退立身穷达都会因是否能知稼穡而有天壤之别。他这里推许吴康斋、刘忠宣与何粹夫的力行躬耕，并以他们为表率，躬耕乡间以稼穡治生。

明末社会乱相横生，风俗败坏，人伦失序。张履祥有言：“今日寇盗遍天下，朋党亦遍天下；名士遍天下，饥民亦遍天下；贪官遍天下，狐狸亦遍天下。”^{[2]249}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不能够承担维系一个正常社会的职能与责任。显然，儒家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社会立身处世有其巨大的风险。张履祥没有停留在简单的道德说教之上，他考虑到主体在现实社会中的基本需求在人格养成、塑造上的意义。他因之说：“能治生则能无求人，无求人则廉耻可立，礼义可行。”^{[2]1043}反之，“学者处乱世，绝仕禄，苟衣食之需不能无资于外，虽抱高志亦将无以自全耳。”^{[2]172}明末的上层党争与文人结会，清初的变节投诚与高立声名，都是张履祥所反对的。如何既能够活于世上（“以自全”），又能够坚守自己的人格（“抱高志”）？作为步入乡间的寒士张履祥认识到治生，尤其是稼穡的重要。他既在思想上强调这一点，也在实践上真正作到耕躬田亩以守乱世自处之道。

二、“道惟在豫”的农业理论

张履祥既像他所推崇的吴康斋、刘忠宣与何粹夫一样，重视农业，躬耕田亩，走入田间；更为可贵的是他从当地气候、天时、地势、水流、土壤、作物，以及人情世故等方面，自觉总结升华相关的农业知识和理论，为中国古代特定地区农业生产水

平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履祥所在的嘉湖地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粮食与经济作物产区，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虽然一生在外课蒙，但张履祥自己有田十亩、地若干，每到农忙季节必回家力耕。在多年的“种果树桑，课耕育蚕之细”生活中，张履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江南特定区域的农业知识，并以自己的学识与担当精神，在吸取其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所在地区相关的农业经验从而形成了具有一定成熟度的农业理论。这一贡献既让他高于吴、刘、何诸人，也让他从一名自觉的道学家而兼有农学家的学养，从而拓宽了理学家的人生面向。

作为理学家的张履祥，毕竟不是一般的农业劳作者，他丰富的农业理论体现出了作为理学大家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有着程朱理学“居敬穷理”的思想特色，也有着“务求实效”的实学内涵。张履祥著有《补农书》。明人陈克鉴在《补农书引》中说：（张履祥）“凡田家纤悉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而田里树畜之法，则取《沈氏农书》为本，而更致详于末务，所谓‘廊庙山林俱有事’也。”^{[2]1389}既纤悉必究，又事而有理，这是从经验到理论的重要突破，体现了《补农书》的学术与实践意义。其中一些具体的经营方法对于农业生产与农史研究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3]98}农史学家陈恒力盛赞张履祥的《补农书》：“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作品，同时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

1. 注重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

《补农书》和《沈氏农书》同属嘉湖地区的农书，前者补充了后者在水稻生产与桑树种植方面的不足，尤其着重介绍了桐乡地区一些重要的经济作物与瓜果蔬菜的栽培方法，体现了张履祥对农业生产技术重要性的认识。第一，他强调稼穡之功贵在于勤，不可在农事上偷懒。“凡事利必兼利，害必兼害。”^{[2]1412}又说：“勤则善心生，爱土物，厥心臧，又勿论已。”^{[2]1424-1425}第二，张履祥认为，农事必须预先规划，加以统筹考虑，才能提纲挈领，抓住关键。他说：“农事大纲有三，道惟在豫。”^{[2]1414}所以，“知戒人之失，而不知备天之失，未为全策也。”^{[2]1413}张履祥丰富的农学思想即以此为发端。第三，

“农事随乡，地之利为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2]1411} 这一种田不如治地(重桑兼及水稻)的思想，反映了中国江南地区经济模式(或说经济阶段)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新型的经济作物生产开始代替传统的粮食作物生产。第四，必须具体分析土性的不同。“天只一气，地气百里之内即有不同，所谓阳一而阴二也。正如一父之子，所受母气不同，则子之形貌性情亦从而异。”^{[2]1415} 又说：“土壤不同，事力各异。”^{[2]1411} 第五，条分缕析农作物之性。如“丝瓜宜近水，饭瓜宜上棚，……冬瓜宜疏，菜瓜宜密。”^{[2]1418} 第六，雇佣农人不要全责备，要唯才是用。“人无全好，亦无全不好，只坐自家不能用耳。……若无大过错，切不可轻于进退。”^{[2]1422-1423} 第七，凡事都应该亲力亲为。“大凡田所坐落，平日决宜躬履畎亩，识其肥瘠，计其宽隘及泥荡水路，莫不画图详记。”^{[2]1425} 他还总结：“凡事各有成法，行法在人”^{[2]1426}，也就是强调既要尊重土地的地性、天时的时性，还要尊重人的创造性、主动性与实践性。

他关于田园规划的构想带有明显的有机、生态、循环特色，代表了中国古代农业、农民的生活智慧：

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路。池之西，或池之南，种田之亩数，略如其池之亩数，则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不可通于沟，通于沟则妨邻田而起争。周池之地必厚，不厚则妨邻田而丛怨。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木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旁室穿井。^{[2]1122}

在张履祥这一规划中，有田有池有室有井有家畜，有场有圃有竹有桑有树。以池水灌田禾，以池泥肥桑竹。基不必高，而池必宜深；池不可通于沟，周池之地必厚。这些“务求实效”的规划非常细致而入入微，既考虑了地理物宜，也考虑了人情世故(“妨邻争”、“妨丛怨”)，表明了张履祥对农业知识与乡村社会的熟悉与理解程度。

2. 重视水利的兴修

立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现实，张履祥高度

重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他既谴责时吏不顾民众生活疏于水利的现实，又基于自己对地势、水域的实际考察，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实际情况又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水利工程建议。

往者夏秋不雨，崇德之东境，桐乡之南境，以至海宁四境之地，苗则尽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庐毁矣，父子夫妇离矣，逃赋役者莫敢归，丐于途者靡所适。桑梓景色若此，当必仁人君子所为惻然流涕，辗转念救不能自己者也。弟于旱虐之日，从嘉禾至阜林，见运河之水逆流而西，势若奔马，支流若长水、陡门、永新、秀溪、白马诸港，急流南下，其势亦然。农人车救，罔间昼夜，是以运河之右，力虽劳而收尚有。至水所不及之处，则弥望皆枯矣。因思自运河之左以达海滨，岂有百里千里之遥？岂有山冈之阻？量其地势高下，亦岂有几十寻丈之殊，而水之通竭，谷之有无，遂已至此？特缘农政废弛，水利不讲，濬治失时，侵占沮塞以至浅涸故尔。^{[2]167-168}

张履祥亲身见证了旱灾下的百姓困苦，也见证了水利的重要意义。运河之右借运河之水，民虽劳但毕竟可以水车自救；河之左，水利不讲，农政废弛，濬治失时，造成满地皆枯，黎民无收。他认为天灾有其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人其实可以先行预防，变被动为主动，而最关键的在于官府是否重视民生所需。因为只要有司鼓舞、耕者佃者共同劳作，一两月之间就能够见其成果。不仅能防涝，也能够解干旱之苦，真正是一举之劳而有百年之利。因此，他从多方面来阐述兴修水利的迫切性、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可操作性。张履祥大力呼吁官方重视水利，说：“水利之不讲，未有如本朝之甚者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事不讲，四海安得不困穷乎？”^{[2]1068}

为争取整个社会之力来兴修水利，他在《与曹射侯论水利书》中分析道：第一，为官者可以借水利之收成完成朝廷下达的征收赋税的任务，从而免去遭黜的担忧；第二，地方富豪巨室之家可以借之而不用担心租金难收与遭寇盗之患；第三，贫民百姓也可以借之有收，而不用担心借贷无门流离失所甚至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伤；第四，仁厚之人也

就可以借之免去见凶灾而目伤心痛,忙于捐献赈灾。他又认为:

又简荒政、兴工役一条,实两得之道。而工役之兴,莫善于修堤防,开障塞。盖非特一时饥民藉以得食,亦可令永远水旱不能为灾,虽灾亦不甚也。行糜粥未矣,糜粥施于老弱及病者为可耳。^{[2]170}

上面这些分析无疑照顾到了各方的利害得失与民政的系统性,有其全面性。如何兴修水利,这就必须考虑到现实的地势。他认为崇德、桐乡在海宁之上水,因此崇、桐成,则海宁成。而嘉兴与海盐因其地势之然,不用花费过多的精力。

三、“劳寒逸享”的社会反思

张履祥生活在乡间并直接参与了农业实践,他站在贫困大众的立场,基于其理学家的悲世情感,既体会到农业生产的不易,也深切同情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人文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他对于乡村社会的关注、农夫苦难的同情,对于吏治的抨击、制度的谴责,代表了知识分子正直的伦理精神与独立的人格品质。虽然他与同时代的学人一样没有提出颠覆不公制度的现实举措,但是他对于农村社会问题根源的反思和认识,却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占有一定的分量。

1. 天灾的无奈

张履祥作有《桐乡灾异记》,这是对桐乡地区重大自然灾害的记载。张履祥亲历并见证了地震、洪水、潮水倒灌、连雨、大雪、大旱、蝗祸等自然灾害,以及这些灾异给贫穷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在张履祥的笔下:灾民望屋而丐,草根树皮都被吃光;穷人卖儿卖女,夫妻母子相散;道路之上,饿死之民相望。他有诗记雨后继之蝗灾的惨状:

闵农初望雨,插植苦不前。植之未成苗,飞蝗忽至焉。趑趑蝻既出,忧心殆已煎。八月霖雨作,沟渠成巨川。车庠兼晨夜,伊谁敢息肩。所冀雨灭蝗,庶几小有年。重经水旱后,残喘或得延。岂知祸尤笃,降此虫万千。集根苗遂槁,集榦穗失鲜。初犹十二三,渐乃靡一全。弥望皆朽折,西陌接东

阡。苍天诚何意,斯民日颠连。仁爱宁异古,必也民多愆。我友其敬矣,三复有皇篇。^{[2]15-16}

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农民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这一压力既来自于社会阶层的利益格局与身份认同,也来自于在人类物质手段匮乏下大自然的灾祸。从等雨插植苦雨不及,到雨至秧未成苗却又赶上了蝗虫幼虫出现,也就开始如煎一样地担心蝗虫可能成灾。本来还希望八月的大雨能够消灭蝗虫幼蝻,虽然日夜不息车庠不停排涝去水,但为了能够小有收成养活自己也毫无怨言,可恨的是蝗虫最终还是成千上万。蝗虫之灾,是那个时代农业国家极大的灾难,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无疑更是灭顶之灾。“集根苗遂槁,集榦穗失鲜。初犹十二三,渐乃靡一全。弥望皆朽折,西陌接东阡。”颗粒无收的惨景,致使张履祥质问苍天:“仁爱宁异古,必也民多愆”,表达了对自然灾害的无奈之情。

2. 人祸的悲愤

假如说自然灾害还仅仅是无奈,那么现实的人祸对于百姓而言无疑是敲骨吸髓、雪上加霜。张履祥对吏治败坏、盗贼猖獗、兵匪一家所造成的流民失所与民众死亡痛加鞭撻,并且认为吏乱是引起其他乱相的根本原因。显然,天灾与人祸加剧了百姓的生活艰难。“自盗起至是,越二十年,良民死者犹千万计,盗贼死者不啻倍徙,若其游离失所,窜徙奔亡者,何可胜算?”^{[2]518}显然,天灾是引起盗贼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盗起又造成了百姓的游离失所,甚至是千万计的死亡!张履祥还结合桐乡之地的实际,具体分析了乡民一再遭难的原因,不在灾变,而在于吏乱。他说:

桐乡之地,北枕烂溪,南接长水,中贯运河,车溪、沙渚绵络其间,去震泽百里而近。苟畜洩得宜,可无旱涝之患。加以土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特以水利不讲,所至壅浅,雨暘愆时,遂足为害。近自三纪,人情残薄,官长下车,绅士胥隶罔念桑梓,导以殃民之方。遽乃弊政日滋,表里为厉,盗贼奸宄,无惮肆行,而善良丧气,往往邱墟矣。念自我生之初,家幸殷穰,俗号长厚,盖乐郊也。乃壬午以前死于饥,甲申而后死

于盗、于兵、于吏，旧乡旧井，其忍言哉？^{[2]518}

民有四死，饥、盗、兵、吏，而最为不应该的就是吏。因为既然地利优越，缺少的就是人为不足。张履祥谴责了官长、绅士、胥吏不关注民生民情的殃民，也对引起兵乱的朝代更替表达了愤慨。不同于三代圣王，现代的卿士庶人“思不逮乎雨暘，趾不举乎疆场，祁寒暑雨人受之，水旱螟虫人忧之，东阡西陌弗之辨，秫稂菽麦不之别，以至良顽勤惰异其情，壮老强羸异其力，劬动休乐异其时，均弗之识也。燕息深居，坐资岁入，几不知稼穡为何事，面目黎黑、手足胼胝为何人。”^{[2]572}而且，这些怠于政事、不识稼穡、不知民事的官吏士绅仗势依权侵扰小民，哪里还能与百姓相亲近？张履祥还记载了就在天灾不断时朝廷仍选宫女，地方县官公然以肉稻喂狗并且要求人民为其建生祠的事实。

3. 制度的控诉

张履祥之所以有对天灾的无奈、吏治的悲愤，是基于其长期乡间生活对农村、农民现实境遇的考察。他亲历、见证的社会灾难使他的社会反思更加深入，而他的理学大家的知识视野也使他能够反思民众现实苦难的根源不仅仅在于天灾、人祸，更在于社会深层的制度不公，他对那个时代农村社会问题的思考达到了历史的高度。

他在《祷雨文》中，极言民众之苦：“吁嗟皇天！今者尊卑易常，贤否倒置，政令拂宜，赋役繁急，苞苴大行，盗贼肆起。含生之民，横离非罪，死亡无算。愁惨怨毒，上干天和，其致水旱，理固应有。但今耕种之人，善良为多，逃兵刃，事田作，既苦于贪墨，又屈于强暴。征输外迫，衣食内窘，吞声隐痛，以延视息。及夫鳏寡孤独废疾之人，尤绝依赖。若降凶灾，是仅存善良复蒙大虐也。天心仁爱，宜为恻然。爰率众哀吁，愿赐膏雨，以渥时耕，宁匪良均休，无善人失所。吁嗟山川神祇！盖罔弗闻知。”^{[2]649-650}所谓“尊卑易常，贤否倒置，政令拂宜，赋役繁急，苞苴大行，盗贼肆起”，这是在谴责制度的不公，社会的失伦。张履祥认为面对这些不齿的吏治行为，仁爱之上天理应降灾以惩之；但是，现实情况是善良、无辜的耕种之人仍在承受着这一切，造成他们虽“存善良复蒙大虐”的结局。

张履祥质问道：“义乎？不义乎？矧德未必果能过之，恶能享而弗作也。”^{[2]572}又说：“呜呼！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父母之所生，自天子至于庶人，同类也，何忍相为凌侮如禽兽哉？”^{[2]575}他将这一善恶赏罚不公、同类相为凌侮的现状，一诉至制度层面，表现出了对社会不公的深层理性思考。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素朴平等意识，张履祥继承了这一宋明理学的优秀传统。天不私覆，地不私载，人人皆为父母所生，天地所成，是什么造成了人类互相相残，禽兽一般？他说：

覆载生民一而已，大人小人莫不有事以相贸也，孰宜劳而耕于野？孰宜逸而享于家？特以幸而有产，不幸无产之故，使劳者不免饥寒，逸者肆其衍乐。^{[2]572}

认为“无产”与“有产”，是造成“劳者不免饥寒”与“逸者肆其衍乐”的根源。他谴责了好逸恶劳者，却能于家享受；而辛勤劳动的人们，却只能守困处穷地流落荒野的社会制度。显然，张履祥这一谴责与批判具有极其深刻、合理的思想内涵。他还认为官吏士绅颠倒了人际关系，其实并非上者恩赐于下者，倒是下民养活了上者。清代史家赵翼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5]527}一批士人、官员如徐阶、董份、申行时、董其昌等缙绅占有的动辄数万亩、数十万亩的膏腴田产，就是不择手段从小民那里劫夺过去的。他们这些豪绅显宦无法无天的恶行，最终形成了明后期土地兼并的高峰。^[6]

综而言之，张履祥作为王学大兴而又走向狂禅后期朱理学的自觉继承者，一反明末以来“空谈心性”的道学流风，从实行、实效、实干出发，力求寻找民众困窘根源、改造乡村社会弊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尤其在经历了清代明政的现实刺激与战乱动荡后，张履祥对于农业、农民、乡村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是他那个时代对于农业、农民、乡村最为关注、最为熟悉的学者之一。他亲身参与农业劳动，为他形上的道学精神提供了夯实的实践基础；而他穷理尽性的理学知识，又为他提供了观察农业、农民、乡村生活的高明视野。正是在

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张履祥发出了“孰劳者不免饥寒,孰逸者肆于衍乐”的时代质问。他虽然不能够提出有效改变不公社会制度的良策(这是那个时代的任何思想家都做不到的),但确实通过自己积极参与乡村生活、总结农业知识、揭示社会不公的根源,为减轻民众的饥寒困苦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注释:

- ① 张履祥有联:“四海良谋惟井牧,六经大义俱耕耘”。(参见《杨园先生全集》,第405页。)也就是既坚持道学家的六经立场,又重视力耕的实践理路。

参考文献:

- [1]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12册[M]. 长沙:岳麓书社, 1993.
- [2] 张履祥. 杨园先生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 [3]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学史(初稿):下[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4.
- [4] 陈恒力. 补农书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 1958.
- [5] 赵翼. 廿二史札记[M].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8.
- [6] 范金民. 鼎革与变迁——明清之际江南士人行为方式的转向[J]. 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5(2): 26-41.

责任编辑:曾凡盛

(上接第63页)

清明祭祖扫墓时,将茶叶与其它祭品一起摆放于坟前,或在坟前斟上三杯茶水,以祭祀先人。^[14]

总之,在祭祀中,茶是纯洁无邪、充满灵性的灵草,用茶祭祀先祖,祭天谢地,告慰神灵,是向天地、神灵、祖先表达敬意的祭品奠物,期望得到神灵庇佑,求得国泰民安,家庭和顺美满,也即借茶的清灵实现“天地人”和乐。

参考文献:

- [1] 李昉.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七·梦二[EB/OL]. <http://www.shuku.net/novels/classic/taipinggj/tpgj277.html>.
- [2] 王秀萍. 明清茶美学思想研究[D]. 湖南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58.
- [3] 张东. 商务茶水礼仪刍议[J]. 秘书之友, 2011(10): 41-45.
- [4] 陈蓉晖, 屠阳. 从待客礼看现代文明与传统礼仪之冲突[J]. 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 2007(5): 25-26.
- [5] 杨东峰. 茶文化中的茶礼[J]. 东京文学, 2009(6): 76-78.
- [6] 雷戈. 廷议程序与君臣秩序——后战国时代的一种思想史分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10):

71-75.

- [7] 施由明. 明清中国皇室的饮茶生活——明清中国茶文化研究之二[EB/OL]. <http://www.docin.com/p-549405265.html>.
- [8] 宋轶兰. 浅议传统人生礼仪[J]. 阴山学刊, 2003, 16(6): 70-72.
- [9] 尾生. 三茶六礼——含茶成语[J]. 福建茶叶, 2003(1): 42.
- [10] 李都荣. 从“妻、妾、威”看女性的尊卑差别[J]. 内蒙古电大学刊, 2012(2): 26-27.
- [11] 曹雨. 话说我国民间的茶礼仪和茶俗[J]. 贵州茶叶, 2011, 39(3): 45.
- [12] 李利. 中国的茶祭风俗[EB/OL]. [2011-04-17] <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2011/04/17/017447910.shtml>.
- [13] 陈茜. 云南少数民族茶祭祀研究[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 29(1): 143-145.
- [14] 杨江帆. 入乡随俗茶先知——中国少数民族及客家茶文化[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15-17.

责任编辑:曾凡盛